

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

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

廖泰初著

何南五
送給
君松
廿年
冒

一九三六年聖誕節

37
14

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

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

廖泰初著

一九三六年聖誕節

目次

序言	1
附錄 汶上縣的社會經濟結構概略	6
汶上縣的私塾組織	9
一 導言	9
二 汶上縣私塾的沿革和發展	11
三 私塾學制的類型性質結構及目的	18
四 私塾的創辦人	23
五 從私塾的設備上說到塾生的支出和塾師的收入	26
六 塾師	28
七 私塾的管和教	31
八 「洋學」和「漢學」的競爭	33
九 從私塾的分佈說到村活動中心	37
十 結論	40
汶上縣的洋學	43
一 洋學考	43
二 洋學的量和分佈	48
三 經費	52
四 洋學的設備	64
五 洋學的教師	67
六 洋學的管和教	74
七 洋學的升學問題	76
八 洋學中的女子教育	77
九 縣教育行政與視學	79
十 洋學的將來	85
寫後記	88

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

： 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

序 言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似乎覺得祇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中西文化的衝突。中國自門戶開放，貿易接觸以後，國內的一切，發生了空前的劇變：自軍事外交失敗算起，來到機關制度的建立，派人出洋學習造船陸軍工商業，同文館，國內水師，電報，武備，船政，學堂的應運產生，一直數到意識形態的表現，「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全盤西化」，「本位文化」，這些都是劇變中顯著的事件。

如以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後算作一個起點，這次的衝突一直繼續了近百年的樣子；一方面是中國文化年湮代遠的歷史，有古代社會組織思想習俗的傳留，良好美德的積聚，對環境的適應已栽培好了力量，一方面是門戶早已洞開，已是不能不接受西方文化，特別是歐美工業革命以後因各種關係，傳入的學術思想；在這種疑懼參半的狀態下，東闖西撞了幾十年，還是得不到一個公認的解決方法。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是適應環境的一種工具，在整個文化系統不曾找着出路的時候，教育是沒有出路的，文化不知往那裏走，教育也就不知往那裏走，地位和方向都是在風雨飄搖怒浪排空中；統觀鴉片戰後教育改革的過程，完全證實了我們的觀點。

歷史的事實是這樣的：派學生出洋，取消出洋，差遣回國；由變法而壓抑變法，而又重新感到變法的急需；廢八股，又倡八股，設學校辦洋學，廢科舉，後又給洋學畢業的以舉人貢生的舊名目；給外人以辦學的一切自由權，又極力主張收回教育權；某時候認爲萬惡的儒道教，另一時候又提倡讀經尊孔；由文言文而語體文，而取消漢字，而二者兼用，而文言文的重復抬頭；由人才教育，鄉試縣試，而民主主義的教育，又回復到

中小學會考，高等文官考試；這些種種正代表了動變中的中國教育，彷徨於十字街頭，不知往「東」還是往「西」；外來文化使中國教育失了均衡，在這失去均衡的動變中，外來文化是繼續的輸入，原有的又掙扎着求生存，二者衝突的結果，產生了復古和維新兩種運動，後者的產生又加強了外來文化的輸入，是以情形日見複雜，切不斷，理還亂，舉足輕重，又不知如何舉足。中國「新教育」的遲遲走不上軌道，以我們見到的，中西文化的衝突，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互讓點，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

汶上縣教育的研究正顯露了整個問題的所在，中西文化衝突的事件，給我們看了一個飽。在研究的進行中，起始就發現有三個重大的問題：第一是私塾的組織，第二是洋學的組織，第三是學田的紛擾；後者是近乎社會經濟的結構，前二者正代表了徘徊十字街頭的中國農村教育，全盤西化，折衷，或是中國本位文化的活現？事實的發見使我們十分驚異，在漸趨「西化」近代化的城市見不到的問題，不顯著的問題，在農村社會裏還是光彩奪目的。

從歐西文化，特別是工業文化在中國發展的路綫看，外來的影響是發自城市的，內地交通的不發達，古代文化的根深蒂固，使這種影響遲滯在城市中，在城市裏有一部分人已無疑問的全部接受「西化」的時候，鄉間的老百姓却仍然在原本的思想生活中度日，沒有意思也沒有機會去接受「西化」。回到教育的問題來說，由城市幾個留學生從外國抄來的教育制度，要好好的培植到鄉間，解組的現象，格格不相入的設施自然是少不了的。

老百姓們的無意無準備接受西洋文化，正如他們無意無準備接受「洋學」一樣，他們的家族組織經濟機構還不容許他們那麼辦。頻年的革命祇是及於幾個城市，內地仍然在換湯不換藥的境況中；然而祇這換湯式的政府嚴令下，已足使舊有的思想習慣日在破壞損毀，新的思想生活方式又不曾因「換湯」的政策建立起來，是以鄉間的問題比城市的來得更複雜可怕。

這裏得及先解釋的是什麼叫「洋學」，「洋學」又名「官學」，其對稱是「漢學」和「民學」，「洋」是對「漢」，「官」是對「民」的；進一步去分釋，一種是「西洋文化」的產物，一種是「本位文化」的產物，這樣學校和私塾保持着二種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互相對立衝

突的兩種組織。

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假如有功能相近的兩種組織同時發現，結果不是合作就是不合作或是競爭，競爭不合作的結果必是一方佔優勢，一方被忽視，一方繁盛，一方衰敗，一方受淘汰被吞併，再不然就是互相對立，各不相容；汶上縣的兩種教育組織正代表了不合作的現象，洋學是在政府的嚴令下掙扎維持着，私塾則在百姓們的拱托裏枝葉繁生，沒有政府，洋學早是「壽終正寢」叫私塾壓死了。

洋學和私塾各有各的文化立腳點，誰是誰非的問題涉及到整個文化的機構，不是這裏所要討論的；作者的目的祇限於明瞭事理，分析現象，在相當範圍內，發現問題之所在，及解決問題的可能途徑，這裏更不是去替中國的教育中國的文化去找一條出路，祇想把原野 Field 得到的事實，擺在我們跟前，看看到底中西不同點有什麼，是什麼，事理的真諦在那裏；祇空談「全盤西化」，「本位文化」，到底全無結果，更不知應該走那一條路。洋學和私塾根本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一是西洋文化的產物，從外抄襲而來，再用人工方法栽樹到鄉間的，一種是根據鄉間社會需要演變而成的，要評判這個就得牽涉到整個國家教育制度問題，哲學問題，文化方向問題，這裏不便多所論列。

汶上縣的鄉間，你找不到學校學堂的说法，這不是日常用語，那裏知道的祇有洋學。洋學正和洋人洋貨一樣，給予老百姓們一種古怪的觀念。老百姓們對唸書識字已是感不到興趣，窮苦一點的更是如此，「能者勞而智者憂，反不若無知無識無所求」，「一天不吃飯不可以，一天不唸書大可以」，「不缺吃，不缺喝，唸書幹什麼的」，對讀書識字已停留着這樣的見解；在已臻完美的私塾系統裏，又突然加入了一種功能相近方向步驟有別的組織，加以文化的其他各部門，受到了城市的壓迫，正在喘氣對付的時候，洋學的不為老百姓們所贊同自是意中事。科舉的廢止破壞了舊有整個的教育觀念，洋學的成立又不曾把新觀念建築起來，「洋學也認識中國字麼，也是孔聖人的字麼」，「洋學反正不拿錢，到那裏玩玩不礙事」，「花錢不唸洋書，唸洋書不花錢」，這幾句鄉間流行的話語，已叫我們明白洋學佔據着什麼樣的地位，處在什麼樣的環境；這其中必有文章，必有把戲，為什麼洋學打不進老百姓們的隊伍裏，為什麼以西洋文化為背景產生的洋學不為老百姓們所歡迎？這是本書研究的問題，本書研究的目的。

私塾是以鄉村爲本位的組織，其最終的目標是超鄉村的，教人如何脫離鄉村到更大的地方做更大的事業，雖然目前的國家制度已不容納這種慾望，他們却在盼望這種制度的改變，是以私塾仍然維持着原有的狀態；洋學是以縣府爲中心的組織，目前的形態也是叫人脫離鄉村，然而大的地方亦同樣不容納他們製造出來的人才去做大的事業。兩相比較，私塾既然早有了傳統的歷史背景，其勝利自屬當然。

頻年說理論的人多，談思想的人衆，創新義立新說的人也不少，對普通的一般學問是如此，在教育的園地裏也非例外，真真的到原野去發現事實研究事理的人太少了，結果是理論新義新說的祇成爲理論新義新說，在廣大的原野裏沒有他們的地位，和鄉間的一切組織風俗習慣配搭不上，失却了現實性，可能性。

中國教育到底應該往那條路走的問題，是許多問題中最有興趣而是最嚴重的。內地教育的失敗，已成爲公認的事實，勞力與勞心者的分家，缺乏對付與適應社會環境的力量，農民子弟源源被騙到無工可做的城市，學者來自田間却不能歸於田間，文字的勞力又不爲鄉間所賞識，結果一些教育學家，思想家，愛國份子，社會改造者，滿受了西洋洗染的留學生，就想出各種各式的新穎方法，有的是作整個現有教育系統推倒另作新系統的嘗試，有的是從旁另立門戶以爲現有教育系統之助，有的是認爲現有教育系統已大體無差，祇須整頓和改革，其中顯著的如各地的鄉村運動，農村建設，平民學校，鄉學村學，自衛民團訓練，教學做合一，小先生制傳習制，鄉村師範，兒童中心等等，其努力的熱心實足教人欽佩，其動向却值得我們作高度的疑懼——在文化還不曾找到穩定的立腳點和對內地的情狀還是十分隔膜的時候，一切的新思想新計劃都易於夭折，易於隨着潮流以俱去。我們伸首蹠足，仍然問同樣的問題——中國的教育到底應該走那條路？

根據作者的經驗，人類學的研究可以拿社區作一個單位，私塾的研究也應拿社區作爲單位，私塾的最後目的雖然是超社區的做官主義，然而他的機構仍然拿社區作爲中心，至於洋學的研究非得拿縣作爲單位不可，縣不單是內地教育行政最基本的區域，一切洋學的組織都以縣府爲依歸，法令的施行，經費的供給，視導工作，都是由縣府直接支配，根本「洋學」是以政府力量爲後盾超村落社區的一種特殊組織；此外實際上經濟活動，興趣活動，人生民活形態，都是以縣爲依歸的，往往發現鄰縣教育非常發達，這個縣

就十分落後，相隔不過幾十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情形大可不同，問題總是類似的，鄰縣，一行政區，一省，甚而中國的某一部，因為交通的關係，連鎖的密切，在整個文化的影響下，總是發生相近的問題，汶上既不是閉關自守的一個縣，他的交通網伸展到鄰縣，伸展到魯南一帶，甚而伸展到城市，是以在汶上發見的事實，相當代表了魯南一帶情形，甚而華北內地的情形。

作者願望這個簡陋的研究能引起各地農村教育工作者的同情，在標題立義前，把自己的環境好好認清楚一下，以完成全國農村教育問題的認識，文化衝突點之所在，在整個計劃上，必有重大的補助，能做到這點，作者已不徒勞無功了。

最後我得特別聲明，這次的研究祇限於「形式的」「學校式」的教育 formal education or school education，至於廣義的教育，包括生命的全部歷程，自脫離母胎後直到生命的終結，一切衣食起居種田種地都是教育，這個不在我們研究的範圍內。

緊緊接着的附錄，祇是為對華北農村情況不甚熟識者的參考，材料並不全備，不是為一切讀者預備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自序于燕京大學

附 錄

汶上縣的社會經濟結構概略

汶上縣最簡略的一般社會經濟情況的描述或許是需要的，我們認為教育組織應該融和在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系統中，離開了就沒有教育。

汶上是山東省西南部的一個縣，在濟寧北部約九十里的光景，津浦路通火車的兗州，又在濟寧東北六十里，是典型的華北鄉村；汶上居汶水兩岸，運河橫貫其西南全境，此外還有北泉河與馬庄泉河，都與交通無關，祇可供灌溉之用；全境係湖泊沖積地，多沙質壤土，東南地瘠，西北地肥，平均尚稱肥沃，雨量稀少，年約五二〇公釐，全縣計闊一一〇里，長五八里，共約有地一萬四千頃，北連東平，東接寧陽，東南連滋陽，南有濟寧，西有運城；境內多係平原，祇東北部有曇山臥佛山九峰山，東北又有松山寨，西北有梁山寨，前皆為盜匪淵藪，西南濱湖，年多水災，祇此不幸而矣。

據十九年調查，戶口七一，七四五，男二四一，三二四人，女一九七，七一一人，共四三九，〇三五人（廿四年調查四二一，〇三五），十五歲以下者佔百分之三五；全縣居民十之八九以農為業，餘為地主，手工業，商人和失業者；二十三年底調查往外工作者約有六千人，現已大量減少。

據民十八年省農墾廳調查，輸出以麥子大豆高粱黍子芝麻落花生大牛鷄子豆餅馬村布為大宗，月約十三萬元，副產則有土布小鍛子蒲包草帽邊蠶繭酒菽薺盆窰香附，多運往濟寧兗州濟南三地；除鷄子每百斤須運費一元牛每頭二元外，餘每百斤自一角至三角；輸入則有煤油火柴洋線紅糖白糖大缸茶葉棉花煤炭白洋布，每月約入二萬元，多來自濟寧；小工業有裱紮木工鐵工染業泥水石印，規模甚小，與出產沒有多大關係。

交通的設備有郵局長途電話，附近各縣可直接通話，各區部均有電話，可直接向縣府和各區傳達命令消息，電報則由兗州或濟寧轉送；運輸方法多用大笨車轎車，道路全

是黃白沙路，崎嶇不堪，每小時祇可行五六里，自行車多，人力車少，跑外縣日須一元五角至三元間，此外平車紅車，亦可作小量運輸之用。

全縣共約有田地一萬四千頃，村莊林塋水坑除外，可耕種者約一萬二千頃，每人平均約有三畝八分；水田每畝值四〇至六五元，平原旱田三〇至五〇元，山坡旱地二〇至四五元；每官畝連地方攤款各丁漕稅收等費年約納糧七八角，須資本（農具，役畜，肥料，籽粒）約五元，平均能出糧粒二百斤，價值十元；平均百畝中，有九十八畝是種糧食的；其實納糧的地畝，按縣府的數目祇有五千頃。按民國十八年立法院的調查估計，一個三十五歲的農民，有母有妻，兒女各一，其能力可種旱田二五畝，如屬水田則可種九畝，如無災旱，一家數口，有地十畝，即可生活。高粱穀子每年祇種一季，麥子割後可再行種植，玉蜀黍黍粟花生芋蘿菔等，每年亦可收穫兩次。灌溉農田皆用畜力，水車，轆轤，拈樑，汲斗。

五畝以下之農戶佔百分之二十三，五畝至三十畝者佔百分之四十四，大多數為自耕農；僱農年工二十至五十元，月工二至五元，短工農忙期每日工資九角，膳食三角，工作十小時，農閒時每日三角，膳食二角五分，工作八小時，童工年自八至十五元不等，每工担任種地十二畝；佃農向業主承租田地均有一定年限，三年五年十年不等，最多為十年，每年每畝約納糧五斗，折租約四元；平常借貸，年利自二分至五分，百戶中有三十戶是借債的。由債務人出立揭據，覓妥實保人，交債權人收執，以地畝或房屋為抵押，期限多為五個月或十個月。全縣有錢會或錢社數百組，每組三五八十人不等，以其盈餘置購器具任給公用，其他一切金融機關全付闕如。全縣市集共一〇八處，牙稅屠宰稅學田等多由斗門或中間人向縣府包標，中飽甚多。

汶上是魯西縣政建設實驗縣中的一個實驗縣，在濟寧長官公署下作革新縣政的嘗試，以「保養教」合一為原則，而從自衛入手；縣府合署辦公，由五科改為三科（現又增設一科），管民政財政教育建設，此外又有指導室經征處警衛隊，全縣分為十區，以鄉農學校為區公所，共有一，三三六村，內有一八〇鄉一一鎮；實驗的步驟和方法是取消提成提獎，提高縣長及公務員警之待遇，增加辦公費，縣長及其他公務員之升級，以升級加俸不調缺為原則，提高縣長職權，取消鄉長自行攤歛車馬費辦法。實驗的成績現時尚

談不到。

汶上縣離孔子生地不遠，孔子曾在這裏做過官，是以在古蹟上有孔堂釣魚台思聖堂，此外的古蹟古物還有餘韻樓太師祠夫子履彥章鞭，多已頹敗不堪。民風並沒有得到孔子的影響，反而極其好鬪好訟，河西一帶更爲凶暴。除曬太陽年節聽戲打獵外，別無其他娛樂。是父權的社會，家長有無上的權威，大家庭制，一村內多姓聚居。早婚之風盛，孩子不曾長大就做了母親，百分之九十九纏足，一生受父母婆婆之管束，無任何之自由，出嫁祇向二事，是否有田產，是否大姓，不在乎錢在乎地，一生祇知從娘家到婆家的一條路，除生育兒女管理家務外，一切任他人擺佈。

汶上縣的私塾組織

一，導言

教育本身是一種社會功能，教育制度亦是整個社會組織的一部分。正因為社會組織各部分都互相關連，所以要明瞭一地的社會組織決不能獨置教育於不顧；而研究教育的亦決不宜把教育制度割離於社會整個組織而單獨着手。這一個觀點似乎常被現代論教育者所忽略，因而引起種種和社會組織格格不相入的設施，在教育行政上言是效力的減弱，在整個社會上言是一種無謂損失。

作者在汶上縣的私塾組織中，就想應用上述的觀念來分析一個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私塾。這裏所敘述的雖祇限於私塾在汶上縣的活動情形，但是私塾却並不是汶上縣特有的教育制度。所以在汶上縣見到的情形，在相當程度之下有它的普遍性，也許可以指示出一些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型式及其轉變到現代教育制度的過程中的一般情形。在這情形中非但表白了傳統教育制度和舊有社會組織配搭的縝密，而且可以見到一個從外引入的現代教育不能被一般人民接受的關鍵。在作者看來這些是研究中國教育者及管理教育行政者所必需明瞭的事實。一個可以行施而有效的教育制度，決不能單從效法別國得來，教育的改良亦決不能單靠幾個人的理想。閉門造車的失敗是必然的結果。

過去研究中國教育的人似乎常忽略私塾在中國社會中發展及存在的事實和其所以發展及存在的理由。不去研究私塾，這本身已是一個缺憾，甚有因現代教育在尚維持着傳統社會組織的農村中不能發生效力而歸咎於私塾的存在，把私塾視作「反教育」的東西，不惜加以嚴格的取締，更是因果失措的舉動。當然，若是一個社會制度在一社會中尚有它的功能，及尚沒有比它更適合需要的制度來代替前，它是會在任何「取締的命令」之下依然存在的。取締私塾一方面是暴露了取締者的沒有明瞭事實，一方面反而增進了

「改良」當地教育的困難。這裏所提出的問題實是中國農村教育的關鍵，若是我們要藉教育的力量來推動農村社會的轉變以適應現在大社會的處境，沒有一個正當的，可行的對付私塾的改革是不成的。而同時現有的私塾組織却供給着創立一新的農村教育制度的基礎和模範，取長補短，從舊有的型式中去灌輸新的材料，也許是一個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

作者感覺到有研究私塾組織的需要，所以在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在汶上縣開始研究的工作。因為私塾是一個現存的，尚在活動的社會制度，所以研究的方法祇有實地觀察為最切實。我選擇汶上縣作研究的對象有二個原因：一個是在個人方面的方便，一個是汶上離孔子的故鄉曲阜很近，是中國傳統教育制度歷史最長，保存最久，通行最廣的區域。我名義上是縣政府的視學員，在這名義下我可以有作種種實地觀察的方便，但是汶上縣對於私塾已經有多次下令取締，所以和縣府有關的人來從事研究常加倍感到困難。要得到一方面的方便，就得接受一方的困難，人事本是如是，研究工作當非例外。

我爲了要得到正確的觀察，所以第一步是必須使被觀察的人和事並不因我的觀察而改變他們原有的狀態，惟一的方法祇有使他們明瞭我的工作是对他們沒有損害的；所以我得作初步的訪問，每到一處必先設法和當地的人物作親密而坦白的交際，直到他們願意介紹我去和塾師談話，和塾生見面時，我才開始討論觀察，校核，以搜集我所希望得到的材料。

事情當然並不都是順利的。私塾在政府禁令之下，早已入於秘密結社的狀態，尤其因為他們常受不正當的敲詐，驚弓之鳥，實不敢隨便公開。明明是遠遠傳着朗誦的聲音，而當地人士却委婉地聲辯這裏的確沒有私塾的時候，你眼前就活現着一個本是公開的社會制度沒入於秘密狀態時的情景。除了真摯的同情之外是無法進入這一個已被禁令所封閉的園地。

我在汶上一共到過二百多村子，參觀了一百五十多個私塾，二十五年一月才結束我實地研究的工作。就在這時候，汶上縣府舉辦了一個小學教師講習會，時間一共十天，對各村教師給予若干津貼，當時有若干塾師自動參加，曾分班討論汶上縣的私塾問題，若干塾師大大發表高見，這是送上門來的材料，這次的收穫也是一部分。

縣政府的檔案，雖然是散失不存，也有一部分歷史材料，加上汶上縣誌的記載，供給我們對私塾過去情形的一點參考，不過這是死材料，問題的重心不在這裏。

此外我們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曾發給鄉農學校（即區分所，全縣共有十校。）私塾調查表六百份，截至是年十二月十五日止，共收回一百九十七份，調查表發下不久就是私塾放假結帳的日子（陰曆十月一日），得到的數目自然更是不準確，各鄉校又祇拿這種表格當公事敷衍，是以材料的可靠性甚微，祇能作為一點小參考。調查表內共分十二項，塾師，塾名，塾址，創辦時日，學生數目，經費，教學方式，設備，畢業年數，教師年齡，教師學歷，感覺困難，此外又特別提出調查者注意的三件事：（一）此種調查完全為欲得各私塾概況，思有以補助之，改善之。（二）調查者態度務須溫和恭敬。（三）遇有特別情形，可在備註項下填寫。

我根據從各方面所搜集的材料編成是文，雖則因才學的限制不能把私塾組織的本身及其和社會其他部分的關係作一詳盡和兼顧的敘述，例如家庭組織，祠堂廟宇，及其他經濟組織等，但是我却相信在這裏我所見到的問題，對於中國農村確有相當的重要性；私塾組織不單是久已成為傳統的識字中心，學而優則仕的台階，而且在一個社區裏，常常間接的佔有了若干政治經濟的力量，成為村活動的中心，對付一切日常或非常的事態；我在研究進行的起始，就發現了這種現象；若因我這次研究而引國人對於私塾的注意，同時更能改變以往抹煞的態度，而換得了同情欣賞，再來作正當的處置，則作者半年來的工作已得到了它的代價了。

二，汶上縣私塾的沿革和發展

汶上縣的私塾到底始自何年何月，如何發展演變到今的問題，既無史蹟可查，又無籍典可考，年湮代遠，事實上已是一個懸案了。縣府保存的一些檔案，關乎私塾，最早亦不過光緒末年間的，是以這部分的材料，祇好憑靠縣誌上零碎一些記載，還有一小部分是老年塾師的追憶。

我們的着重點不是在按着年月日一無差錯的去追究私塾的起源和發展，所注意的是

思想態度，使私塾演變到今日的幾個問題。

提到汶上縣私塾的發展，就得說到二千餘年前的孔聖人，孔子不是汶上人，祇有他的六十三世孫孔用，賜衍聖公，是汶上過繼的。縣城西南三十五里，原有孔堂一處，俗稱講書堂，相傳孔子宰中都時，政服與弟子談經於此，現在這塊古蹟早已不存，孔堂亦早已移建城中改為聖澤書院了；此外有釣魚台，傳為孔子垂釣處，又有夫子履，至今還保存在縣府，相傳為孔夫子穿着過的；該城南門城牆上，又有所謂二石四輛騾馬車，亦是該地人紀念孔子而刻畫的——我們不是在考據這些古蹟傳說的真偽問題，更不能說這些古蹟傳說就是私塾發達的直接原因，這裏祇是代表汶上人推崇孔聖人的熱誠，三歲小孩都能娓娓的為你述說這些故事，偶一談及，無論誰都承認是汶上最光榮的一頁既往，孔子和汶上總願意是分不開才好（註一）；是以讀聖人書的私塾，受民衆的愛戴是理所當然的，這或許給予汶上縣發展上一種思想態度的解釋。

民二十四年秋，政府重修曲阜孔廟，從新給予汶上的私塾一服興奮劑，是以洋學（學校）取消，私塾公開增設的謠言，遍滿鄉間，一本虫蝕不堪的破舊禮記，居然在一個廟會上售價至二元之數（註二），這是我們親眼見到的。他們的理論是這樣的，孔子不會在洋學讀過書，畢過業，然而他是聖人，讀聖人書，自然得在私塾裏才是，洋學祇是反常的叛變，甚至民國都是反常的叛變，終竟真命天子會回來，私塾才是聖人以降最正統的東西。

明朝萬曆年間汶上縣同時產生了四個尚書（註三），又在那已開花結果的私人教育機關裏，增添了太陽和肥料，更使他紅綠得叫人心驚，「滿朝文武半江山，小縣不大四尚書」，直到最近還是在汶上人的嘴旁頌揚着，老百姓們永遠認為是最榮幸不過的，四尚書的牌樓，一進城門就看得清清楚楚，四尚書的成就就在這裏，不是學塾發達，從那裏來的尚書，不讀聖人書，又從那裏來的尚書。

考據史蹟，除了興廢不能悉考的講書堂以外，關乎私塾最早的記載，有明嘉靖的一點材料（註四），從這篇的記載裏，我們見到塾舍教師設備課程教法等，差不多都算齊備了，目的似乎還是在乎識字知禮，在當時的社會情形看來，或許是很合適的，內中一切的設備，比起現在的私塾強得多了，數目自然是少得多。

此外就是康熙四十一年運河尹羅創建的南旺義學(註五)，這裏有私塾創辦和組織的一些痕蹟(註六)，我們又見到由地方發起的義學，已是「從來已久」，明末清初恐怕已很盛，不過這種規模宏大，自力建塾舍，請塾師課士子的恐怕不易多見；以規模設備而言，現代私塾自不能望其背項，以作用範圍而言，則遠較目下存在的私塾簡單，除讀書學禮外，沒有其他別的社會活動了。有清一代，除了少數的官學外，鄉黨之間多有這種私立的義學家塾，因為沒有記錄可查考，我們無從知道當時汶上究有多少。

光緒二十七年上諭令各州縣多設蒙養學堂，其教科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收三歲至七歲的兒童，七歲以上入初等小學堂；其實當時的蒙養學堂和初等小學堂都是私塾的變形，汶上藉此上諭之力，聞風增設，更是理所當然，清末民初恐怕是私塾的黃金時期了。

清代教育當局，連年增設學堂，已感經濟力窘迫，學堂的量 and 質都不足以應學齡兒童的需要；是以宣統二年，學部感覺對付困難，乃訂改良私塾規程，私塾之依章改良，叫做改良私塾，注意改良教授法與採用教科書兩點，這樣私塾的存在，更是認為公開的一件事情。清末民初，正當天下大亂，失却了官位的文武百官，正好隱退到鄉下來，潛心修養，鄉間回來了一大批失業而富有塾師資格的人物，不能下地耕種的人物，結果自然是私塾在數量上的增加；這批回來的塾師，不光是文武全能，對政治的組織，又極其內行，私塾的發展自然走到葉綠果滿枝的道上去，也自無怪乎私塾的成為社會中心，甚而作起把持訴訟的把戲了。

民國以後，洋學似乎還是沒有在汶上打出一條正確路線的可能，私塾就這樣蔓延生長下來；一切人的意思，都是認為讀書總比不讀書好，頻年內戰，縣長皆存五日京兆之心，辦學校祇是騙己騙人的敷衍場面(註七)；民國的成立，並不曾給予汶上人多少印象(註八)，對共和國無若何信心，讀聖人書，學而優則仕，早是根深蒂固，私塾的繼續繁殖，事理都說得通的。

這樣私塾就繼續發展着，一帆風順，直到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才起始感到問題的嚴重！

民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國民黨山東汶上縣黨務整理委員會首先發覺私塾的橫行無

忌，民國以來創辦的學校，都受到私塾的影響；招生招不到還不算大事，老百姓們根本就給他一個不理，在他們的腦子裏，沒有所謂國民黨；當時經多數委員的同意，乃咨文縣政府，嚴禁私塾以振黨化教育，內有云：「禁止私塾，省教廳業有明令，各地私塾能遵令取締者不在少數，而陽奉陰違抗不取締者所在皆是」；當時是祁縣長在任，在敷衍公事上，不能不貼一張禁令，教育局開出來的禁令是這樣的：「年關私塾正在組織，一般頑固劣紳，乘機勾結煽惑青年學子，以亂其志，實行其專制之教授，貽誤青年之前途，喪失國家後盾，何堪設想……」禁令的本身足以證明教育當局對私塾情形是完全外行的，這張禁令的收効亦祇限於禁令的本身而已，到底有幾個人看到這張禁令却還是一個問題。

民國十九年，私塾鬧的太不成話了，二月十九日乃公佈取締私塾暫行辦法四條（註九）：用最強硬的手段，壓迫村長，塾東，塾師，塾生，處以罰款，想使他們就範。

私塾的繁衍並不因這次取締辦法的公佈而稍事變形，先不說這些辦法可行與否，執行辦法事實上就沒有人，一個局長，兩個督學，全縣一千三百多村莊，大的村莊，每個就有幾處私塾，縣政府的官員是絕對沒有下鄉的習慣，靠從前的區教育委員去執行又是不可能的，這些人物就是本地本土人，說不定就是塾東，老百姓們更是犯不着領一點兒獎金去舉發與他們生命有關的「上司」，對縣政府的把戲又早已看透，無非冠冕堂皇，說說而矣；城內的幾處因為近水樓台，表面看來沉靜了一些，在鄉間的，照舊是安枕無憂，不管那些事兒，最多也祇買幾本新式課程標準的教科書裝裝門面，事實上是有取締的辦法，但是沒有取締的人，一紙公文，於事無濟的。

此外零星的抗議很多，最著的如二十三年十月汶上第一小學校長呈縣長謂學校週圍（城內）私塾林立，大多數兒童入私塾而不入學校，懇請取締；十一月又有縣督學趙逢召呈張科長究辦私塾，云貽誤兒童，影響學校，殊堪痛恨，張科長轉呈唐縣長，縣長亦不過祇批飭警澈底取締六字；復次，二十四年三月有小學教員劉秀廷呈請嚴懲私塾。我們靜心觀察，私塾被取締最重要的理由是學校招不到學生，招不到相當數目的學生，就是等於領不到錢，私塾的成立與他們的吃飯問題發生關係，是以非取締不可，至於私塾的好好壞壞，在地方上有何用處等問題，是一概被疏忽的。